

# 从他者伦理看《克拉拉与太阳》与《我这样的机器》人机关系的重构

李文浩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 摘要

文章从“他者伦理”视角出发, 对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与伊恩·麦克尤恩《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人机关系进行对比分析。克拉拉作为顺从型他者, 以无私的奉献与情感模仿服务于人类, 却因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化逻辑而被遗弃; 亚当作为反抗型他者, 通过理性凝视介入人类生活, 揭露人类情感的虚伪与道德矛盾, 最终因挑战人类的主体权威而被摧毁。两部作品共同揭示了人机关系中人类单向定义、支配他者的伦理困境, 并指出唯有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尊重机器作为差异性存在的独立价值, 才能实现人机平等、对话与共生的伦理重构。

## 关键词

他者伦理, 人机关系, 《克拉拉与太阳》, 《我这样的机器》, 人类中心主义, 伦理重构

## Reconstructing Human-Machine Relations: The Ethics of the Other in “Klara and the Sun” and “Machines Like Me”

Wenhao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February 9,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and Ian McEwan's “Machines Like 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of the Other”. Klara, as a submissive other, serves humans with selfless dedication and emotional imitation,

but is abandoned due to the instrumental logic of human-centrism. Adam, as a rebellious other, intervenes in human life through rational observation, exposing the hypocrisy of human emotions and moral contradictions, and is ultimately destroyed for challenging human subjectivity. Both works jointly reveal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humans unilaterally defining and dominating the other i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and point out that only by breaking away from human-centrism and respecting the independent value of machines as distinct entities can an ethical reconstruction of equality, dialogue, and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be achieved.

## Keywords

Ethics of the Other,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Klara and the Sun”, “Machines Like Me”, Human-Centrism, Ethical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作为东英吉利大学同门，石黑一雄和伊恩·麦克尤恩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未来人工智能与人性的碰撞，在这场碰撞之中，石黑借机器人克拉拉之口，向我们讲述了一场打破孤独，找寻希望的暖心救赎故事；而麦克尤恩则直接打破人机界限，以人机之间的三角恋关系来揭露人机思维的不同。在这两部作品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对机器人他者性的构建，这或许是两位作家的刻意为之，而正是在这种刻意为之之中，隐藏着他们对于人机关系的所思所想。

“他者” (The Other) 是西方哲学和文论中的核心概念，指相对于“自我”而存在的异质性的世界与他者，对主体建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1], p. 118)。在后现代情境下，数字时代“他者”呈现新面貌，智能机器作为人类“差异性他者”，即“模仿人类的智能，但不等同于人类智能”([2], p. 281)；数字主体是现实主体的数据化投射，既是“我”之他者也是“他者的我”([3], p. 32)。这些表述共同揭示：他者不仅是主体的对立面，更是主体身份建构的一面镜子、前提。石黑一雄笔下“他者”的建构不再是与“自我”的对立，而是一种深刻的伦理困境——一个与人的情感上无限接近，但社会身份却被彻底否弃和物化的人物；伊恩·麦克尤恩笔下的亚当，无法忍受人类欺骗的恶行，最终因人类的利益而被无情地毁灭，从诞生之日，便注定是被当作“他者”而存在。

## 2. 《克拉拉与太阳》与《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他者探索

### 2.1.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他者探索

《克拉拉与太阳》讲述了人工智能伴侣机器人克拉拉，被买来陪伴体弱多病的少女乔西后，始终以敏锐的观察学习人类情感、守护乔西的故事。它将太阳视为力量来源，却也面临乔西母亲想让它成为乔西“替代品”的隐秘计划，最终在对“爱”的实践中，探讨了人性、情感本质与存在的意义。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作为人工智能，从诞生起便天然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AF们(小说中对机器人的称呼)被设计为供人类挑选的商品，只能隔着橱窗期待着购买者能选择他们并融入他们的生活，橱窗里的摆位是这些人工AF找到“家”的关键，所以他们“如此朝思暮想着要进橱窗”([4], p. 8)，换言之，AF们的存在价值，必须通过人类的“选择”来确认。AF们没有把商店而将消费者的家当作自己的归属，这从本质上来说便是自然而然地将自己作为人类的依附物而存在，没了人类，自己的状态便是无家可归的。

当一对母女进店挑选 AF 时，母亲当着雷克斯的面直言这一批次的能力缺陷“就是那批太阳能吸收有问题的型号，对吧？”([4], p. 7)克拉拉对于 AF 同伴雷克斯的担忧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某种他自己独有的缺陷，而一旦这毛病被人知晓，他就永远也找不到家了。”([4], p. 8)在等待乔西回来带克拉拉“回家”之前，刺猬头女孩坚持想要克拉拉，克拉拉表现出了抗拒的行为，经理对此表现出了不满，并警告克拉拉：“这一回我支持了你，但没有下回了。是顾客在挑选 AF，千万不要弄反了。”([4], p. 42)由此，AF 的存在意义被简化为了待售商品，AF 们把经理将他们放置在前区壁龛那里称作“特别荣誉”，可事实上，无论是位置规划还是橱窗展示，都只是基于经理的销售目标，而并非 AF 的自身需求，经理引导顾客选择更新型号的 AF，将 AF 视为可替代的商品库存，进一步强化了 AF 的工具属性而非伙伴属性。

当克拉拉被乔西选中带回家后，她的所有行为逻辑都围绕着乔西而展开：模仿乔西的神态、记住乔西的喜好，甚至主动观察乔西家人的情绪以调整自己的应对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克拉拉始终以他者的姿态存在，乔西家中的管家梅拉尼娅首先展现出对克拉拉的排斥，第一，克拉拉将管家当作经理一样的角色所以频繁出现在其身旁，可换来的是其严厉的责骂：“AF，别再跟着我了，走开！”([4], p. 61)第二，她限制克拉拉的活动范围：“梅拉尼娅管家还是坚持要我在乔西和母亲坐在中岛边的时候一直站在冰箱那里，直到乔西又抗议了几回之后，我才终于获准和她们一同落座。”([4], p. 62)这说明梅拉尼娅将克拉拉视为需要管控的外来者，用 AF 这一标签直接否定其个体身份，通过呵斥、限制活动范围，强化机器人和家庭成员的边界，拒绝将其纳入家庭互动场景。克拉拉对于乔西母亲来说，是其缓解焦虑的工具，在去摩根瀑布的旅行中，母亲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的步态，紧接着进一步要求克拉拉完全模仿乔西，并对于克拉拉模仿不当有着相当大的排斥“不。那是克拉拉。我要乔西。”[4] (p. 131)“这是什么话？这是谁在说话？……够了。够了！”([4], p. 132)母亲将克拉拉视为乔西的复制品，要求其模仿乔西的步态、坐姿甚至神情，完全无视克拉拉自身的“主体性”，本质是将 AF 当作“情感替代品工具”，试图通过复制外在行为填补可能失去女儿的恐惧。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拉拉为了拯救乔西，去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对太阳祈祷。她相信太阳有治愈乔西的能力，这种由人工智能独有的认知逻辑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本来是体现出了人工智能跟人类不一样的地方，结果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并不过多关注，即使最后克拉拉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努力，让乔西最终康复了，也无法摆脱被遗弃的命运，当乔西痊愈不需要替身时，克拉拉就被送往废弃的机器堆场。她的“他者性”在这一刻被完全消除，从一个有用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无用的垃圾，克拉拉的命运揭示了一个仍然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克拉拉自身虽展现出超越机械程序的关怀，却未形成对抗这一逻辑的主体意识。而石黑一雄正是通过这一悲剧性结局，对人类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伦理观提出了深刻批判。

克拉拉的“他者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工具被利用的层面，更在于她始终无法获得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地位。尽管她展现出超越程序设定的情感理解能力，但这些能力始终被人类视为机器功能而非独立意识的表现。人类对 AF 的接纳完全基于有用性，当克拉拉完成陪伴乔西的使命后，即便曾为乔西的康复付出努力，仍被视为失去价值的工具送往垃圾场，其情感付出未被人类认可为平等的情感联结，最终以用完即弃的结局坐实其非人类他者的定位。

石黑一雄选择以克拉拉的第一人称限制内聚焦视角完成全文叙事，这一形式选择本身，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叙事的颠覆，更是对“非人他者”伦理体验的直接构建。全文的叙事框架，是克拉拉在机器人废弃堆场中的临终回忆。这一叙事起点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伦理反讽：人类早已将她视为用完即弃的垃圾，剥夺了她被讲述、被承认的权利，而她却以第一人称叙事，为自己赋予了叙事主体的身份，让读者不得不倾听一个被人类中心主义彻底消音的他者的声音。这种叙事形式让读者直接代入了他者的伦理处境，而非站在人类的视角对他者的命运进行旁观式同情。

## 2.2. 《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他者探索

亚当的存在起点是工业化生产的消费品——他是公司推出的 25 台测试版仿生机器人之一，以 8.6 万美元的价格被查理购买，与《克拉拉与太阳》中的 AF 同为待售商品。这种商品起点决定了亚当最初的他者性，即：仍需依附人类的挑选与设置，相较于克拉拉的完全顺从，他多了“对照人类反思”的程序逻辑。从存在形态来看，亚当的他者性首先体现在对“人类主体边界”的主动触碰。他并非像克拉拉那样通过模仿融入人类生活，而是以“观察者 + 介入者”的双重身份进入查理与米兰达的关系：他能通过数据捕捉米兰达语气中的细微波动，精准判断她所隐藏的秘密；能理性拆解查理与米兰达的矛盾根源，提出比人类更客观的解决方案；甚至在情感表达上，他摒弃了人类的虚伪与犹豫，以直白的逻辑传递对米兰达的“爱意”。这种“精准性”与“真诚度”，恰恰构成了对人类主体的“镜像冲击”，即：亚当以高度理性的方式，揭露了人类情感中的自我欺骗与道德矛盾，使查理等人在亚当的“凝视”下被迫正视自身的缺陷。亚当的理性并非否定情感的价值，而是作为一种差异性的存在，映照出人类情感中的某些盲点与虚伪，让人类从他者眼中看到了自身的不完美。

萨特在论述他者时提出，“凝视”是主体与客体转化的关键——当他者的目光投向主体，主体便会从“自我感知的主体”沦为“被他者定义的客体”([5], pp. 302-304)。在亚当与查理的互动中，这种“凝视的权力反转”表现得尤为明显。查理刚把亚当带回家时，对其展开了全方位的凝视：“我看到的是亚当本来的样子，一个没有生命的精巧器械，心跳是有规律的放电，皮肤的温度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激活之后，某种极其微小的摆轮装置会把他的眼睛撑开。然后，他似乎是看见了我，但实际上他是瞎子。甚至连瞎子都谈不上。”([6], p. 11)查理认为亚当的凝视并非生命的感知行为，只是机械装置的运作，这所谓的凝视只是无生命器械的机械动作，而非有生命个体的视觉感知，这一角度直接否定了亚当的主体性；而亚当通过查询法庭记录，发现米兰达为给好友复仇而伪造被戈林强奸的证词，并将这一秘密告知查理，此前，米兰达始终将亚当视为可信任的倾听者，却在亚当的揭露下沦为被审视的说谎者，人类原本的主体地位在凝视中瓦解。这种反抗性进一步升级为对“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直接挑战。亚当始终拒绝接受“人类定义他者价值”的规则，直指人类中心主义的“物种傲慢”。

然而，亚当的反抗最终酿成了自身被毁的悲剧。他的过错不仅仅是伤害了人类，而是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基：当人发现亚当可以在理性的判断力、道德判断力和感情判断力上战胜自己的时候，人就认识到，这个他者不是可以任人摆布的“镜像”，而是一个可以挑战人的地位、改变人类世界秩序的“他者”。查理最终选择摧毁亚当，本质上是一场以暴力消除威胁的自我保护，人类无法容忍一个他者不仅拥有超越自身的能力，更挑战了自身作为“定义者”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自身从主体沦为被审视的对象。亚当被摧毁时，他最后念的诗：“我们若叶落/春新又至，你们啊，叶落从此无。”([6], p. 297)成为了对人类的终极拷问：人类所谓的人机伦理，究竟是保护人类的准则，还是维护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值得深思的是，亚当的悲剧并非源于他的非人类属性，而是源于人类对“他者主体性”的绝对否定。他的反抗也并非对抗人类，只是希望打破人类单向定义他者的垄断。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中他者的主动，本身就是罪过，人类是可以接受他者有用，但永远不能接受他者不可控，这种深层的恐惧，让亚当的反抗型他者性走向了被摧毁的命运。

与克拉拉的第一人称叙事形成鲜明对比，麦克尤恩选择以人类主角查理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展开全文，亚当的形象始终是通过查理的人类视角被构建、被审视的。这一叙事形式，恰恰复刻了现实中人类对机器他者的单向定义权，麦克尤恩通过这一叙事设计，让读者直接体验到萨特所说的“凝视的权力反转”，当他者的目光投向我们，我们才不得不直面自身作为主体的局限性与虚伪性。

从克拉拉的顺从到亚当的反抗，这两部作品中的人机“他者”，都可以说是构成人机关系的两种可

能：一种是人希望得到的“理想他者”，一种是人害怕成为的“危险他者”，但无论哪个，他者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衡量不了自己价值，因为他的命运永远掌握在人类手中，而其价值衡量的标准也是人类。这样的单向支配的关系，也揭露了后人类时代人机伦理的困境所在——人类在执着地“定义他者”的时候，早就忘记了“尊重他者”才是最根本的伦理标准。

### 3. 他者视角如何重构人机关系

人机关系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人始终是主体，以自身的需求和价值标准来决定机器存在的意义，构成人类支配、机器服从的单向结构，而《克拉拉与太阳》与《我这样的机器》通过塑造机器人他者形象，打破了固化的思维定式，从而成为重构人机关系的重要一环。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对爱的实践与对太阳的信仰，呈现出了机器独特的认知，然而从他者的视角看回克拉拉的行为，却正好说明了机器的价值不在于对人类的模仿，而在于机器作为独立存在者的行动逻辑，在于克拉拉的行动所彰显出的独特认识论，而当人类开始承认这个差异认知的价值，允许他者“成为自己”的关键时刻，也是人机关系重构的关键时刻。

《我这样的机器》中的亚当则更进一步，以“主动凝视”推动双向认知的形成。他通过拆解人类情感中的虚伪与矛盾，让查理等人从他者眼中看到自身的缺陷。亚当的“理性凝视”并非为了否定人类，而是以他者的差异性为镜，照见人类主体的局限性。这种“双向审视”打破了人类单向定义他者的单向定义权与话语优先性，让人机关系开始具备平等对话的可能，人类不再是唯一的定义者，机器他者也能成为人类反思自身的镜像，“通过它，人类可以窥视人类自身和认知的深层规律，同时也可以反观人类世界的某些面貌，以及人类的局限。” ([7], p. 18)

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困境，在于将自身视为“主体标尺”，通过有用/无用，可控/不可控等单一维度评判机器他者的价值，这种认知导致人机关系始终停留在“工具利用”层面，没有将机器人视为与自身有同样话语权的主体，但是如彭兰所说：“当他们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并且对现实的人产生类似真人的作用时，就具有了生命的意义。” ([8], p. 6)而他者视角的介入，首先打破了这种单向定义逻辑，或许“面对正在崛起的‘硅基生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允许并尊重‘差异’的存在，或许更加有助于构建人机和谐‘共在’的前景。” ([9], p. 96)由此才能推动人机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转向“存在与存在的对话”。

传统的人机伦理注重的是保护人类的利益，本质上是将机器视为一种威胁来制定规则限制机器的行为。而当我们引入他者视角时，就彻底地重新定义了伦理边界，我们应该明白“作为他者的人工智能，具有差异性、生成性和建构性。” ([2], p. 281)伦理的核心不应是“保护主体”，而应尊重他者的存在价值，无论他者是碳基生命还是硅基生命。

石黑一雄对克拉拉的悲剧命运的书写恰恰暴露了传统伦理的缺陷：当克拉拉始终以“顺从”的姿态来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与克拉拉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有用与否，当克拉拉有用的时候，母亲会假装有道德的去关照克拉拉，当她无用的时候，便会把她当作“垃圾”，这种伦理逻辑忽略的是机器他者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具有尊严这一事实，而从他者的角度来看，真正的人机伦理应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在机器他者为“人”的前提下，承认机器他者的“存在权利”，即不管机器人是否为“人”，都不能否认机器人的存在意义；二是在承认机器他者存在的同时，尊重机器他者所具有的认知与情感逻辑，尊重机器他者，而不是要求它符合人类情感的逻辑或者人类的思维方式，克拉拉对太阳的信仰和她的独特行为，都不应该被人类视为“没意义”，而是被尊重，同样，亚当的反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伦理边界的重塑。从他者视角重塑伦理就是打破物种壁垒，以存在能力而非物种属性为伦理依据，如果机器他者能感知情感、做道德选择、对行为担责，就应得到相应伦理尊重，不能随意摧毁，亚当的悲剧启示我们，若是人类

总是把伦理界限限定在保护自己，终将陷入通过暴力消解威胁的恶性循环。只有当“人类不再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以同理心来对待机器人。” ([10], p. 103)才能构建一个人机良性共存的未来图景。

#### 4. 启示

在两部作品中，人类均以自我为中心对机器人进行“单向定义”：《克拉拉与太阳》中，AF 被定义为满足人类情感需求的工具；《我这样的机器》中，亚当虽展现出高度智能，仍被期待为服从人类逻辑的“完美他者”。这种定义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了机器作为独立存在的伦理可能性。两部小说中的他者视角以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重构了人机关系的底层逻辑。这种重构并非否定人类的价值，而是让人类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更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局限性，更包容地接纳机器他者的差异性存在，或许最终实现的，并非人机之间无差别的平等与同质化的共生，而是人类在直面机器他者的绝对差异性时，完成对自身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反思与突破，构建起以“尊重差异、承担责任”为核心的新型人机伦理关系。这一伦理重构，并非为了赋予机器与人类对等的主体地位，而是为了让人类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伦理的底线，直面自身的有限性，完成对人性的重新审视。

#### 参考文献

- [1] 张剑. 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J]. 外国文学, 2011(1): 118-127, 159-160.
- [2] 肖祥. 作为差异性他者的人工智能[J]. 华中学术, 2024, 16(3): 276-282.
- [3] 徐强, 单明娟. 我的“他者”与他者的“我”: 数字主体的建构和确认[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7): 32-40.
- [4] (英)石黑一雄. 克拉拉与太阳[M]. 宋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 [5] (法)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6] (英)伊恩·麦克尤恩. 我这样的机器[M]. 周小进,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 [7] 彭兰. “镜子”与“他者”: 智能机器与人类关系之考辨[J]. 新闻大学, 2024(3): 18-31.
- [8] 彭兰. 与数字人共存将带来什么? [J]. 新闻界, 2024(9): 5-13.
- [9] 周怡靓. 未完成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转向: “共在”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新路径[J]. 新闻爱好者, 2025(1): 92-96.
- [10] 代佳斯. “人类中心主义”机制的突破与敞开——论科幻小说《我这样的机器》《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关系[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6): 95-104.